

戰略研究的批判與反思： 典範的困境

陳偉華*

- 一、前言
- 二、戰略研究緣起、定義與範疇
- 三、方法論與典範建立
- 四、戰略研究的質疑與批判
- 五、戰略研究的回應
- 六、戰略研究的反思與前瞻
- 七、結語

戰略研究起源甚早，意義與範疇隨時代演進呈現多元。冷戰期間，以國家中心論為主軸的戰略研究，將國家追求生存的角色具體實踐於國際社會中。兩極解體，批判者質疑戰略研究知識建構所採行的方法論欠缺科學性與可證性，挑戰其理性決策與預測能力的真實性。本文綜整戰略研究批判者的主要論點，發現戰略研究受時空環境變遷影響甚大，不僅需面對典範失落的危險，亦需反思其學科困境，從而澄清其價值功能所在，分際出與軍事研究及安全研究差異，重新建立該學科應有的獨特性。最後，本文指出，批判者的觀點雖尖銳但值得省思，戰略研究必須揚棄過時

*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所助理教授。E-mail: chenweihwa@msn.com

投稿日期：2009年07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2009年12月17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二十七卷第四期/1-54頁。

的舊典範，建立新的研究領域，況且無論國際環境如何多變，戰略研究仍是當前國家求取生存與安全不可或缺的手段與工具之一。

關鍵詞：戰略研究、典範、嚇阻、理性決策、安全研究、軍事研究

一、前言

1997年 Richard Betts 以“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為題，發表於著名期刊 *World Politics* 上，引發戰略研究社群軒然大波（Betts, 1997: 5-33）。2000年 Betts 再度於另一著名期刊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上發表 “Is Strategy an Illusion?”，論證性的反思與回應挑戰者的尖銳批判（Betts, 2000: 5-50）。隨後，多位戰略研究學者也陸續展開自我批判與反思，探討戰略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並試圖釐清戰略研究重點與未來研究方向（Payne, 1996: 2001; Gray, 2002; Baylis et al., 2002）。誠然，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問題、種族衝突問題、安全環境與環保問題、核子擴散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逐漸成為國際研究的關注議題。以往，以國家安全為首要考量，並以如何有效運用武力為重心的戰略研究，因安全威脅型態的改變，受重視程度日益遞減。相對的，以廣義安全為題的安全研究蔚為顯學。批判者質疑，冷戰期間戰略研究的哲學是偏頗不當的假設，由於其對國際戰略格局時遷勢移與國家安全環境變遷事實的錯誤觀察與理解，從而虛擬化戰略研究知識建構的方法論，致使研究典範難以實證於現實世界中。

面對如潮的批判，戰略研究真的是窮途末路嗎？抑或是外在環境改變使得典範失焦，造成國家中心論的 (state-centered) 價值失落？又或者戰略研究與安全研究及軍事研究本就屬性相近，研究轉移是正常現象而已？種種問題，是無數戰略研究者面臨的嚴肅挑戰。爰此，本文試圖對戰略研究進行分類、檢證與反思。研究發現，戰略研究批判者論點多半侷限於冷戰期間的核子嚇阻研究，因此儘管因

環境變異造成論述失焦現象，但戰略研究依然有其知識論上的學術與實用價值。全文從戰略研究緣起、定義與範疇為起點，探究戰略研究知識建構的方法論與典範建立，再從挑戰者與研究者的角度進行批判與反思，最後釐清戰略研究的角色與功能，並提出未來可能研究方向。

二、戰略研究緣起、定義與範疇

(一) 研究緣起

在西方，戰略 (strategy) 一詞起源甚早，最早的戰略思想與實際運用可遠溯自希臘時期，稱為將帥之道 (generalship) (McLean, 1996: 480; 鈕先鍾, 1998: 12-13)。之後，拜占庭 (Byzantine) 帝國時代的毛萊斯大帝 (Emperor Maurice)，係最先將軍事教科書「戰略」(希臘文 Strategicon)，用於訓練高階將領 (Palmer, 1978: 73)。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一書作者之一 Felix Gilbert 指出，戰略的起源可追溯自馬基維尼 (Nicolas Machiavelli) 時期。基本上是一種自助與求取軍事勝利的行為 (Gilbert, 1986: 11-15)。在中國，「戰略」一詞為晉朝司馬彪所創，然實際戰略研究則起自春秋戰國時期，〈孫子兵法〉即為典型的戰略研究代表作 (鈕先鍾, 1995: 3)。

近代戰略研究的濫觴約在 18 世紀末葉至 19 世紀初，此期間可說是戰略研究理論化成形時期，軍事與戰爭之間的關係是戰略研究的主軸，而其中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興起歐戰，並在「法普」、「法奧」、「法俄」、「法義」等多次戰爭中，不斷地以寡擊眾、以弱擊強贏得勝利，從而促成克勞塞維茲 (Carl

Von Clausewitz) 與約米尼 (Antoine Henri Jomini) 以拿破崙獲勝的戰略運用為研究對象，分別寫下了《戰爭論》 (*On War*) 與《戰爭藝術》 (*Art of War*) 兩部不世之作。這兩部鉅著影響後世至深，尤其對當代軍事戰略的用兵之道，更是參考典範之著。Gray 所著的〈當代戰略〉 (*Modern Strategy*)，也是以 Clausewitz 為研究起點 (Gray, 1999a: 16)。Buzan 也認為，上述兩部作品對後世影響深遠，其中 Clausewitz 無疑是 19 世紀以來，影響軍事與戰爭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思想開啟近代戰略理論研究的先河，當然也是拿破崙之後傳統軍事作戰的典範 (Buzan, 1987: 32)。Holsti 因而特別指出，Clausewitz 的戰爭思想，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學者探討國家之間戰爭問題時，不斷重述的理論概念 (Holsti, 1996: 6-7; Holsti, 1991: 13)。由此看出，戰略研究初期的理論思想發展，受軍事武力運用影響極大，其內涵幾乎全是軍事戰爭的經驗理論與實踐。是以，戰略已成為一門專事研究軍事及戰爭問題的學問。

由於科技與戰爭工具的不斷創新，傳統步兵、騎兵與砲兵的作戰方式，逐漸由縱深寬廣的機械化部隊所取代，加上航空與水面技術的進步，戰略思想的演進隨著單純的平面作戰，延伸至立體與多面 (multi-dimensional)。從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明顯看出戰爭工具改善後造成傳統作戰形式的改變，然而戰略研究仍舊停滯在軍事與戰爭關係的探索上。英國李德哈特 (Liddell Hart) 的《戰略論》 (*On Strategy*)，法國薄富爾 (Andre Beaufre) 的《戰略緒論》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與《戰略：間接路線》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以及美國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的《海權》 (*Sea Power*) 是此期間的代表作。特別一提的是 Mahan，其著作完成於一次大戰前，但海權

思想未受當時美國重視，卻受英國大力提倡。大抵說來，此期間雖然得利於戰爭工具的改良，但地面作戰仍是戰爭的主導力量，因此戰略研究仍受 Clausewitz、Jomini 的傳統作戰思想影響。

一般咸信，將戰略予以學術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事，也就是冷戰的兩極對立時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核子武器問世造成戰爭型態丕變，並促成戰略研究的快速轉型。Booth指出，戰略研究學術化的起點應該是 1945 年之後，研究發展可分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研究取向與重點（Booth, 1994: 109-119）。第一階段為 1945-1955，稱為早期戰略研究，也是戰略研究的概念形成期，期間並無特別著作問世。第二階段為 1956-1985，稱為戰略研究黃金期（golden age），此期間是戰略研究進入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的重要時期，「嚇阻」成為戰略研究的核心議題，研究的範疇不再侷限於軍事層面，成為跨越政治、經濟、心理、歷史、外交、甚至科技各個層面的科際整合式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隨著冷戰兩極對立進展，多元學術專業思維（discipline）與方法論湧入，其中最具代表性學者應屬物理學者Kahn、經濟學者Schelling、歷史學者Kissinger、政治學者Brodie及Huntington、安全學者Jervis與戰略研究學者Gray與Buzan等所做之研究，¹整體研究達於顛峰狀態。第三階段為 1985-1991，稱為晚期的戰略研究，前期建立的典範受到嚴厲批判，戰略研究陷入混亂與方向不定的時期。至此，Booth與Buzan均表示，以冷戰為主的戰略研究舊典範已過時，而新典範仍未產生，所以戰略研究已熄火打烊（extinction）（Booth, 1994: 119; Booth,

1. 非軍事專業背景學者從事戰略研究者甚眾，以 Kahn (1960), Schelling (1989), Kissinger (1969), Brodie (1973), Huntington (1983/1984), Gray (1999a), Jervis (1989); Buzan (1987)著作較具參考性。

1996: 334-335; Buzan, 1991: 272-273; Buzan, 1998: 33-35)。

Booth 所提出的論點是在冷戰結束初期，當時戰略研究因「核子嚇阻」失焦，加上代之而起的多面向國際安全問題浮現，戰略研究的熱潮移向廣義的安全研究。此期間，面臨外在環境快速變遷，致使理論與實務不斷遭受質疑與挑戰，戰略研究遂進入重新定位的階段，一方面重新界定嚇阻的內涵與意義；另一方面藉自我批判與反思，釐清戰略研究未來應然的研究重點與取向。Betts、Payne, Gray、Baylis 與 Wirtz 等學者，以批判的觀點來探討後冷戰時期戰略研究所面對的困境，試圖釐清戰略研究重點與未來研究方向（Betts, 2000: 5-50; Payne, 2001; Gray, 2002; Baylis et al., 2002）。

從演進的過程可以發現，戰略研究其實起源甚早，從早期單純的軍事將帥統御研究，延伸至近代拿破崙之後的軍事戰略用兵研究，再至 1950-60 年代深入大學殿堂，戰略研究變成複雜多元的學科與知識體系之一，不惟研究範疇變得更為寬廣，意義也因學術蓬勃興盛而寬廣。正是學術研究使其不斷代謝，從而建構出璀璨的研究成果。同樣的，也正是學術使其承受不斷的挑戰與試煉，接受汰蕪存菁的要求。

（二）定義與範疇

儘管一般學者認為戰略研究學術化是源自冷戰，但是戰略本身的研究歷史長遠，從不同時代表人物所作的定義中，概可看出研究者範疇不同形成的差異。

1. 軍職人員

以軍事背景出身者為例，最早將戰略一詞予以適切定義者，首

推 Clausewitz，他認為：「戰略是用戰鬥（engagement）的手段來獲取戰爭的目標（Clausewitz, 1976: 178）。」同時也強調：「戰略之中諸事簡單，卻非事事容易。」（Everything in strategy is very simpl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very easy）（Clausewitz, 1976: 86）。另一位同時期的軍事戰略家 Jomini，名氣上雖不如 Clausewitz，也未對戰略一詞提出任何精闢見解，但其軍事戰略原則卻對日後研究軍事作戰者影響至為深遠，軍事歷史學者 Moran 稱讚 Jomini 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軍事理論家（Moran, 2002: 25）。其後，著名的軍事戰略家 Liddell Hart 提出：「戰略是分配與運用軍事手段達成政策目標的藝術。」他還特別強調，軍事（戰略）行動應該「以迂為直」（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亦稱間接路線），才能爭取戰場上的勝利契機。同時，他認為在軍事戰略之上還有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雖然範圍仍侷限於戰爭探討，但手段則廣及政治、經濟、外交、心理等（Hart, 1967: 336-370）。隨後 Andre Beaufre 定義：「戰略是武力辯證（dialectic）的藝術，或者更精確的說，是意志對立的雙方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辯證藝術（Beaufre, 1965: 22）。」此外，受推崇為當代 Clausewitz 的美國海軍上將 Wylie 定義：「戰略是一種為了達成某些目的所設計的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也是一連串配合意圖完成的手段（a system of measures）（Wylie, 1989: 14）。」美國國防部（DOD）則將戰略一詞釋義為：「綜合運用整體國力工具，藉以達成戰區、國家與（或）跨國之間國際目標的審慎思維與概念（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

從以上軍事專長的戰略研究者定義中，清晰可見軍事武力的角色在戰略策定與運用上的重要性，彼等也致力於將戰爭、戰略與戰術融為一體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核子武器問世之後

的軍事戰略研究重要性不若以往，或許正如 Liddell Hart 針對核武感慨的說：「核武的出現與發展，使傳統戰略研究（尤指軍事）變得毫無意義。戰略研究若再以贏得戰爭、獲致勝利為目的，無異於瘋狂（Hart, 1960: 66）。」換言之，面對核子武器出現，戰略在國家安全的爭取上，只剩「存在」或「不存在」的議題，並沒有所謂的軍事勝利可言。或因如此，之後以核武為戰略研究核心的冷戰期間，軍事背景的戰略研究並無較為突出的典範型著作。

2. 文人戰略學者

（1）武力與政策觀點

最早且最為明確學術性釋義者，應推 1958 年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的定義：「戰略研究是對於在衝突狀況下如何運用武力之分析（鈕先鍾，1995：2）。」另一位著名的戰略研究學者 Gray，將戰略定義複雜化，他指出：「戰略是軍事力量與政治意圖之間的橋樑，既不是軍事力量，也不是政治意圖，而是為了達成政策目的選擇使用或不使用武力之研究（Gray, 1999a: 17）。」Gray 也強調，戰略研究是一種多面向（dimensions）的研究，且以政治及軍事為放射核心，向外連結經濟、科技、地理、組織、資訊、文化、社會、群眾、倫理、時空環境、對手等因素，使戰略研究成為複雜的知識系統（Gray, 2002: 126-129）。Betts 的觀點與 Gray 近似，並試圖將戰略定義為一種連結（link）手段，他表示：「戰略是軍事手段與政治目的間的連結，更是一種手段與目的間的連結（Betts, 2000: 5）。」英國政治學者 Bull 則認為：「戰略是在任何領域的衝突中，如何運用手段達成目的的藝術或科學（Bull, 1968: 593-605）。」經濟學者 Schelling 從「博奕理論」（theory of game）的角度觀察戰略的意義而提出：「戰略

其實並不關切力量使用的效能（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force），而是如何運用（exploitation）潛藏的能力。戰略所關切的不是敵人的好惡問題，而是夥伴的信任程度（Schelling, 1989: 5）。」

此外，也有其他戰略研究學者如 Booth、Halle、Buzan、Murray 與 Grimsley 等，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或戰略制定過程來定義戰略研究。Booth 認為：「戰略是現實主義下的一個概念，其範疇就是關於如何運力量與工具，來影響國家之間關係的研究（Booth, 1994: 109）。」Halle 則定義戰略研究為：「政治學科項下探討國家間政治關係中使用武力意義的研究（Halle, 1984: 4）。」Buzan 是較為特殊的戰略研究學者，他認為戰略研究為國際關係下的子命題，文獻廣泛又龐雜，難以明確地賦與假說與定義，因此他並未定義戰略究竟為何物，但是他相信戰略研究的主題深受政治結構與科技發展影響無疑（Buzan, 1987: 1-8）。Murray 與 Grimsley 則以「戰略是一種程序（process），也是一種經常面對機遇（chance）、不確定（uncertainty）與狀況模糊（ambiguity）環境條件下，不斷適應變化的過程（Murray and Grimsley, 1994: 1）。」雖然以上學者基於觀察與研究需要而有不同定義，但內容仍不脫將戰略視為是武力與政治橋樑，以及戰略講究手段或是一種程序制定的觀點，而其中仍以武力與政治關係為主要定義。

（2）核武戰略研究

依Booth觀點，冷戰期間針對核武所做的「嚇阻」研究，無疑是戰略研究的重心所在。Jervis因而指出：「嚇阻理論已是當代研究國際安全的典範，也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入門學問（Jervis, 1979: 289）。」的確，當時鮮少戰略研究者足以抗拒此一源自兩極核子對立的戰略主題形成的強烈吸引力。緣於此一戰略對峙，深化了嚇阻研究價值

與影響層面，促成爾後數十年的戰略研究於不墜。正由於獲利於不同觀點的注入與激盪，嚇阻研究遂開展出極富彈性變化的多元決策思考與戰略互動運用。尤其特別的是，嚇阻理論的多面開展，相對增大了軍事力量使用的彈性空間，擴張了決策與手段相互呼應效果。雖然多半的嚇阻研究者並未直接定義嚇阻為戰略研究，但無一不視其研究為戰略研究項下一環。²

綜觀以上，戰略在定義上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軍事專長的戰略研究者，基於特殊軍事背景需求，使其研究範疇聚焦於軍事力量的運用，並以獲取戰爭勝利為目的。第二類為非軍事專長的戰略研究者，在戰略研究的定義上因學科專業背景不同，研究範疇龐雜如政治、經濟、心理、科技、文化等，而有不同的觀察角度，然一般仍傾向於研究政策與武力間關係。第三類是第二類的延伸，研究者雖未直接對戰略研究清楚定義，但研究範疇與性質確屬戰略無疑。同時，由戰略的演進與定義也可看出，年代不同的戰略研究，定義上亦出現些許差異。二次大戰之前的戰略研究，泰半以軍事戰略為主；之後，戰略研究呈現明顯的多元性，而核子武器的出現，尤其促成了戰略研究者從多角度聚焦於核武的互動關係、使用效能、時機與可能影響上。有鑑於戰略演進與定義內涵的多變性，多位戰略學者表示，戰略是相當複雜難解，在技巧與意義上常是非線性（nonlinear）的（尤指核武的出現）發展，也因為戰略融合了地理、科技、行政體系、政軍指揮、理論與準則（doctrine），定義與實際運作更顯複雜困難（Jalonsky, 1993: 3-45; Gray, 1999b: 6-12; Beyerchen, 1992/1993: 59-90）。

2. 有關核子嚇阻與戰略研究的互動關係請參閱 (Jervis et al., 1985: 1-13; Gerasimov, 1982: 55-6; Gallois, 1961: 119-122, 195-210; Brodie, 1959: 177).

本文基於需要，將戰略研究分成若干可供分析的定義與類型，原是著力於研究之便，但是任何學科研究皆有延續性與關聯性，受篇幅所限，取捨之際難免出現遺珠之憾。例如 Luttwak 的《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一書，即為典型例子。該書已有多國語言版本且廣為流傳，內容探討的也完全是戰略問題，卻對戰略一詞無任何明確定義，僅在文中敘述大戰略（grand strategy）範疇，以及附錄中承認自己贊同 Beaufre 的觀點（Luttwak, 1987: 179-189, 241）。所以，上述的分類只是概略呈現差異而已，畢竟戰略研究與軍事及安全研究甚為近似，學者間交叉研究已是常態。因此，本文後段所嘗試的分類與階段劃分，應不致使讀者曲解為分類不清、前後說法不一，甚至邏輯矛盾抵觸之憾。

三、方法論與典範建立

依據前段定義可知，戰略研究在不同階段有其不同研究重點與方法論，從而形成其社群賴以不墜的「典範」。以下將戰略研究的途徑、方法與形成的典範分類概述如後。

（一）研究途徑與方法

John Baylis、James J. Wirtz、Ken Booth 與 Barry Buzan 等學者均曾嘗試將戰略研究予以分類，但也都自承龐雜困難（Baylis et al., 2002: 3-7; Booth, 1994: 109-119; Buzan, 1987: 144-145）。就本文觀點，戰略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徑與方法概可歸納為五類，依其出現時間約略分為：第一類為傳統戰略研究者，研究途徑置於「軍事武力」層面，以 Clausewitz 為主的軍事戰略家為典型；第二類係解釋軍事

「力量」(power)與政治「目的」之間的運作關係，Gray與Booth著作研究具參考價值；第三類為探討嚇阻「理性決策」(rational decision making)過程產生與影響，以Schelling、Zagare、Kilgour等為主；第四類係以「核子武器」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產生的嚇阻效能與影響，以Freeman及Baylis著作為參考代表；第五類則以「文化」(culture)為研究途徑，Snyder與Johnston的研究，開啟了戰略研究的另一視野。

第一類的演進與定義已見前段無需贅述。由於此類研究歷史淵源久遠，所形成的戰略系統也較為單純完備。或者正因得利於其封閉與單純，加上參與者的同質性高，外部挑戰的機會相對較低。嚴格說來，第一類的研究者多為傳統軍職，早期涉入國家決策情形甚為普遍，但在當代普遍民主的社會條件下，涉及政治事務或決策的機會相對有限，因此戰略研究的內容較侷限於軍事層級的分析方法上，此一情形各國類似。就Collins所作的美國戰略層級分類而言(如表一)，通常軍事研究人員涉入之分析研究層級為「國家軍事戰略」、「區域戰略」與「戰區戰略」等三階層為主，至於國家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則是以文人領軍為主的軍文交織的戰略研究(Collins, 2002: 4-5)。

表一 美國戰略層級劃分

	重點	參與者	主要政策	輸入 input	產出 output
國家戰略	國家目標	主政者與 國家顧問	國家政策	國力	國家政策計畫
國家安全 戰略	國家安全 目標	主政者與 安全顧問	國家安全 政策	適度的國力	國家安全計畫
國家軍事 戰略	國家軍事 目標	主政者與 軍事顧問	國家軍事 政策	軍事力量	國家軍事計畫
區域戰略	區域目標	外交首長 與大使	外交政策	外交：經濟 支助	國際規範
戰區戰略	區域軍事 任務	國防部長 與地區指 揮官	獨立或聯 合政策	獨立或聯合 武力	獨立或聯合計 畫

資料來源：Collins（2002: 4）。

其次，第二類的戰略研究置重點於探討軍事「力量」與政治「目的」間的運作關係，也是戰略研究最常見的研究類型。以Gray為例，其戰略研究著作甚豐，從軍事事務、地緣政治、公共政策、科技發展、核武研究、到戰略的歷史文化研究，可謂最具代表性的戰略研究學者之一。雖然Gray擁有大量與戰略相關著作，但重心仍然是以探討武力與政治之間關係為主。³他不斷強調戰略是一座橋樑，也是

3. Colin S. Gray 的著作非常豐富多元，與軍事相關者有 *The Nav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The Uses and Value of Strategic Sea Power* (1994); *Strategy for Chaos: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 Evidence of History* (2002); 戰略與政策者為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1982); *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一種手段。一方面要建立力量以強化政治運作籌碼；另一方面為達成政治目的可以在軍事上採取「用」與「不用」的戰略選擇（Gray, 2002: 90-94；Gray, 1999a: 16-20）。易言之，Gray認為力量的獲得是來自各方面的努力與經營，但是力量為了要達成政治目的，需要仰賴恰當的戰略運用。

Booth 的觀點與 Gray 近似，同樣是探討軍事「力量」與政治「目的」間的連結關係，但他把戰略研究重心置於民族歷史的發展上，並以戰略思想為切入面向，來探討戰略如何運用力量的達成政治目標（Booth, 1979: 1-37）。此外，Booth 也特別提醒，在冷戰結束國際體系結構混沌未明之際，國家安全不再只是單純的外在軍事威脅，而是複雜的內部與外部非軍事的安全問題。因此，面對嚴峻的挑戰與威脅，戰略研究應建立「戰略新思維」（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來因應（Booth, 1987: 30-37; Booth, 1991: 1-28）。但究竟戰略新思維具體的表現是什麼，Booth 並未明確指出。特別一提的是，Booth 早期的著作係以戰略研究為主，但冷戰後期重心則轉移至安全研究。

第三類為戰略「理性決策」過程產生與影響，此一類型受 1960 年代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與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影響較深。Schelling 著名的《衝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書的觀點，是站在決策者的角度來觀察戰略抉擇。他認為，大多

Statecraft for the Next Century (1990), *Explorations in Strategy* (1996); *Modern Strategy* (1999a); 與科技相關者 *Weapons Don't Make War: Policy,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1993); 地緣政治與軍事戰略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1988); 歷史文化研究 *Strategy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2007); 核武戰略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 (1986)。

數的衝突情況是處在可以談判的情勢 (bargaining situations) 下，而參與者獲得期望目標的能力，常須仰賴其他參與者的決策選擇。他表示，戰略所涉及的談判過程是一種「利益」(interest)「威脅」(threat)「合作」(cooperation)「選案」(options)交織的狀態，於是「現狀」(status quo)「雙利」(mutual gains)「互損」(mutual damage)的局面有可能同時出現。Schelling 以嚇阻為例指出，嚇阻是美國國家戰略的基石 (keystone)，而最高效能的嚇阻運用，即是超越軍事技術 (military skills) 不使用軍事力量以達成國家目標 (Schelling, 1989: 5-11)。易言之，Schelling 認為戰略決策的產生，一方面來自與對手互動結果，另一方面卻是善於運用潛藏的力量，驅策對手選擇雙方互利的方案。正是如此有利的互動決策，帶來不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

Zagare 與 Kilgour 同樣是以系統化「理性決策」的「矩陣」(matrix) 模式，來探究戰略決策及可能產生的影響。兩人以對立的兩個角色 (國家) 為對象，從博奕的角度大量運用科學性的計量方式，將嚇阻理論區分為「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兩種，各予以模式化建構出可能的互動關係與組合，藉此模擬出適當的戰略決策，並提出可能的影響 (Zagare and Kilgare, 2000: 7-30; Zagare and Kilgare, 1998: 59-87; Zagare, 1990: 238-260; 陳偉華, 2002: 23-42)。也就是說，Zagare 與 Kilgour 的戰略研究，是探討互動關係下的決策產生與影響，然而前提必須雙方均以理性角度出發。

第四類的戰略研究學者其實不少，但純粹將核武列為單一命題途徑，研究其效能與影響者並不多。Freedmen 於 1981 年出版的《核子戰略演進》(*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Booth 稱其為核武戰略研究的典範 (Booth, 1994: 110)。該書研究範圍甚廣，從

歷史演進探討攻防、嚇阻與侵略、大規模報復、有限戰爭等有深入的探討與解說。對於核武戰略的變遷與不斷發展演進，Freedman 提出了「戰略是不斷創造權力的藝術」，做為其對戰略研究的註解（Freedman, 1992: 281）。此外，Freedman 也以核武為題陸續出版著作，對核武戰略的歷史發展、運用及影響亦有相當深入的剖析（Freedman, 1998; Freedman, 2004）。對有興趣的研究者而言，確具參考價值。Baylis 是另一位將核武視為是戰略研究的重要途徑，但是他認為核武本質上應視為是防衛性質，而不是建立在主動的攻勢發展用途上。其所編著的《核子戰略的創造者》（*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臚列了九位當代核武戰略的研究者共同討論與辯證核武的意義、價值與影響（Baylis and Garnett, 1991）。此外順道一提的是，Gray 也曾在核武問題上有著墨，特別是與嚇阻命題相關。他表示，任何國家在國防安全上，即使維持核子能力（5 枚核彈）上的低度嚇阻（*minimum deterrence*），也同樣能對侵略者產生嚇阻功效（Gray 1979, 54-87; Gray, 1992b: 255）。

第五類的研究是以「文化」為戰略研究途徑，藉以瞭解戰略建構與運用的背景因素。文化係屬戰略思想一環，且早已是戰略研究的範疇之一，但是將「文化」抽離且單獨列為戰略研究途徑，約在 1970 年代之後。最早使用「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詞者為 Snyder，他以蘇聯為例，舉證政軍領導人的戰略指令（*strategic command*）與思維模式，具有制約性的情感反應與類似的文化習慣，從而發現其在核武戰略設計及運用上的共享概念（Snyder, 1977; 莫大華，1996：39-52）。Snyder 別立蹊徑的研究途徑，的確為生硬的戰略研究注入新的思維面向，使戰略研究不再只是以力量與政策為對象，而有了新的戰略觀。

Johnston 對戰略文化另有詮釋，他不認為以文化為戰略研究途徑與 Schelling 的「理性決策」途徑本質上有差異，所不同的只是 Schelling 探討出的是戰略「最佳」(best) 決策，而自己所做的是以歷史文化的角度解釋國家的戰略行為 (strategic behavior) 與決策，當然不會排斥理性決策 (Johnston, 1995: 1-3)。Johnston 研究戰略文化的對象是中國明朝的戰略設計與運用，並以「孫吳兵法」為首的軍事理論為重點，解析中國修建萬里長城與偏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思想，但他認為當代中國解決爭端有訴諸武力偏好的情形。此外，他也認同 Snyder 的看法指出，蘇聯的文化是來自不安全感造成偏好追求「先制攻擊」(preemptive offense) 的戰略，而中國的戰略文化則相對保守，軍事用兵通常講求師出有名 (Johnston, 1996: 216-228)。特別值得一提之處在於，Johnston 將「戰略文化」一詞，由抽象的歷史哲學描述，賦予明確的操作定義和可測性，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Johnston, 1996: 216-268)。

事實上，除了 Snyder 與 Johnston 之外，Gray 與 Booth 也都曾從文化的角度探討過戰略的思想與決策的形成。Gray 的觀點認為，文化包含理念與行為模式，也就是由理想 (ideal) 與行為證據所構成。所以，戰略文化研究是經驗知識的探討，也是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索研究對象的概念系統，從而尋出可以參考的行為模式與脈絡 (Gray, 1999c: 49-69;)。Booth 則表示，戰略文化是一個國家在武力運用上的傳統符號與圖騰，也是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態度習慣、行為模式、以及解決問題慣用的手段 (Booth, 1990: 121-128)。

綜合前段定義以及本節的研究方法分類說明可知，戰略研究是一種多元且廣角度的探索。研究者容或因角色立場與專業知識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觀察面向，例如軍事、政治、經濟、決策、歷史

文化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試圖將研究對象予以概念化的過程並無二致，不同之處即在於方法論使用上的差異。或者正由於戰略研究本身學科交織情形普遍，類似 Gray 與 Booth 多角度探索戰略，並廣泛涉獵軍事、政治與安全研究的學者也非特例。總之，方法論是知識探索的必要手段，亦是同一學科社群分類的參考指標，並由此觀察出該學科的世界觀與價值體系。

（二）典範建立

如果從方法論中可以看出戰略研究者的世界觀，那麼連結該學科不同研究社群所使用的方法論，無疑就是該學科共通的哲學共識，也就是所謂的典範（paradigm）。Laudan 認為典範具有三項意涵：第一、是一套概念架構，用於分類與解釋事物原始樣貌；第二，是一套恰當的方法、技巧、工具，用於研究相關領域的事物；第三，不同的典範有著不同的認知目標與理想（Laudan, 1998: 140-141）。Rosenau 與 Durfee 更進一步精確指出，任何學科理論發展的最高形式即為典範，也是該學科社群認定解決問題的共通法則（Rosenau and Durfee, 1995: 6）。但是 Khun 特別強調，典範不是永恆的真理，而是一套不斷精進的認知形式，因此典範會隨時空遷移而不斷變嬗，藉由不斷的辯證過程使理論建構臻於完善（Kuhn, 1991: 148-157）。以此觀察，典範無疑是時空環境下產物，藉由不斷「否證」去蕪存菁、適者生存的常態性循環著，故而典範的理論形式具有「持續」（continuity）與「變異」（change）的特質，這也正是所有學科成長過程必經之路。

從前述的戰略研究定義、類型與方法論中可以看出，戰略研究各類型都有著各自的概念架構、研究方法與不同的認知目標與理

想。就傳統戰略研究者而論，Clausewitz 的 *On War*、Jomini 的 *The Art of War*、Liddell Hart 的 *On Strategy*、以及 Beaufre 的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無疑是當代軍事戰略研究中較佳的典範，其探討軍事手段運用於爭取戰爭勝利的概念，至今依然普遍受軍事研究機構的重視。其次（第二類），將戰略視為武力與政治橋樑的 Gray 與 Booth。Gray 的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與 *Modern Strategy*，可說是將戰略與政治和武力關係作了最佳的分析闡釋；Booth 的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同樣將政治與武力關係做了必要的連結。第三類以「矩陣」模型為理性決策的戰略研究，Schelling 的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Zagare 與 Kilgour 的 *Perfect Deterrence* 均值得深究。第四類型為核子嚇阻研究，Freeman 所著的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與 *Deterrence* 堪稱是探討核武嚇阻的入門學問。Baylis 的 *The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從多元角度觀察核武效能，也是不錯的參考論著。最後，探討影響戰略行動背後的文化因素，Snyder 的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與 Johnston 的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分別以蘇聯和中共為例，開啟了以文化為戰略研究途徑之一的新典範。（如表二）

表二 戰略研究類型、論點、方法論與代表著作

	研究代表	論述重點 (意義)	方法論	代表著作
第一類 1945 年之前 (傳統戰略 研究)	Carl Von Clausewitz, Antonni Jomini, Liddell Hart, Andred Beaufre	戰略是一種 運用軍事手 段爭取戰爭 勝利的作為	以「軍事作 戰」途徑研 究贏得戰 爭的手段 運用	1. On War 2. The Art of War 3. On Strategy 4. An In- troduction to Strategy

<p>第二類 1956-1989 (武力與政治關係研究)</p>	<p>Colin S. Gray, Ken Booth</p>	<p>戰略是運用武力(軍事力量)達成政治目的的仲介</p>	<p>以「政治」為途徑研究「武力」運用的價值與影響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2. Modern Strategy 3.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p>第三類 1960年代起 (戰略互動與理性決策研究)</p>	<p>Thomas Schelling Frank C. Zagare D. Marc Kilgour</p>	<p>戰略是一種互動狀況下的理性決策(抉擇)</p>	<p>以「決策」的「矩陣」模式分析對奕下的理性選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2. Perfect Deterrence
<p>第四類 1956-1989 (核武研究)</p>	<p>Lawrence Freedman John Baylis</p>	<p>核子武器為戰略研究最有價值的工具</p>	<p>以「嚇阻」為戰略研究途徑藉此探討出其能力與影響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2. Deterrence 3.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p>第五類 1970年代中期之後 (文化研究)</p>	<p>Jack L. Snyder Alastair I. Johnston</p>	<p>以歷史文化觀點探討戰略行動背後的動機因素</p>	<p>以「文化」途徑研究對手的戰略思維模式與行為脈絡</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2.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戰略研究的質疑與批判

如 Kuhn (1991) 所說，典範不是真理，而是歷經質疑批判之後，對學術社群仍具參考運用價值的學說。冷戰期間，戰略研究是現實主義的前沿理論，無可迴避地承受各家學說質疑與批判。然而，對戰略研究的質疑與批判早已存在冷戰結束前，只是冷戰兩極體系形成的對立結構，提供了戰略研究最有利的辯護。兩極解體後，批判者將焦點集中在冷戰期間以嚇阻為知識建構的方法論所形成的典範上。本文綜整批判者的質疑，概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批判戰略研究對知識論的哲學假定欠缺客觀理解，從而錯解「事實」(reality) 的真實反映 (reflection)；其次則是學術與實證能力不足，造成因果邏輯關係錯置的問題；最後，由於戰略研究者涉及主觀偏好，此一狀況下所強調的決策評估與預測能力變得極為薄弱。

(一) 偏頗的哲學假定

此一部份的批判分為兩項論點。第一，戰略研究是以「衝突」(conflict) 為導向的研究，故其重心置於武力問題的研究，是偏執的世界觀，不道德的假設 (Keegan, 1993: 21-22)。Walt 以批判觀點指出，冷戰結束國際環境丕變，戰略研究已過時，安全研究將成為取代武力研究的新取向 (Walt, 1991: 111-112)。Lebow 也強調，戰略研究者對國際安全變化與預期出現嚴重誤判，導致理論本身假定的失敗。所以，當代的國際關係研究應採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的科際整合方式，才是避免及解決衝突的較佳途徑 (Lebow, 1994: 251-252)。Ullman 也質疑，將國家安全定義在軍事武力決策選項上，

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誤解，導致國家只注重軍事威脅而忽視其它危害，使國際關係出現軍事化傾向，而後冷戰時期安全研究的層次、議題與內涵不斷擴大，已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Ullman, 1983: 129; Nye, 1989: 20-34）。

事實上，早在 1966 年 Philip Green 《邏輯死結》（*Deadly Logic*）一書中即已提出批判，指責戰略研究者所發展的核子嚇阻，根本違反社會道德良知，不符合人類所謂的義戰（just war）（Green, 1966: 2-3）。Payne 更具體的表示，戰略研究者應該坦然面對以核子嚇阻為嚇阻理論假設前提來維護國家安全，是冷戰時期最大的無知與謬誤。他強調，除非戰略決策者清楚明白對手如何決策，以及哪些因素是對手列入考慮的要項，否則任何決策都源自無知的假定。Payne 認為，前蘇聯的崩解提供了核子嚇阻美好的想像與結論，以為一切的衝突可以藉由核武來嚇阻。事實上這種欠缺可靠決策資訊的假想，是可怕而無法證實的無知。最糟的是，這種決策思維一直在戰略研究者的想像世界中未曾停止（Payne, 1996: 37-40; Lebow and Stein, 1995: 357）。Davis 與 Gray 也認為，戰略研究者的最大誤導，在於誇張核子武器危險性的恐怖假設，藉此合理化其戰略思維與核武政策。冷戰結束證明這種危險暴力的虛幻性（Davis and Gray, 2002: 256）。

其次是第二部份的批判。此一部份較廣泛深入，且泰半來自對戰略「理性決策」（rational choice）問題的質疑。理性決策向為戰略研究探討決策選項行為時的必要假定基礎，而此一基礎建立於兩項前提：第一，人類行為普遍存有模式，據此，未來行為的可預測性高；第二，理性決策的理論模型可以提供社會科學家所需的研究結果，並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言（Harsanyi, 2006: 1-2）。

對此，Stein 嚴厲批判戰略研究假定的偏頗。他指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從個別、國家至政府官僚體系凡涉及集體利益者，戰略抉擇途徑（strategic-choice approach）都可以有效地適用，但是從認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來看，人是有偏好而且受認知能力所限，所以即使想做到決策理性，但有限資訊造成有限的預測能力，致使決策難以全然理性，何況戰略決策又是以個案為主。因此 Arthur 強調，理性決策理論只會阻礙國家在競爭環境結構與國際無政府（anarchy）狀態下創造自己的願景，其決策模式並不足以充份說明戰略是如何決策的（Stein, 1999: 200, 211-215）。Betts 也提出「資源」（resources）、「選案」（options）、「資訊」（information）等為戰略決策必備的條件，在未獲取這三項前提條件之前，戰略的任何事前政策假設目標都不可能透過手段實踐（Betts, 2000: 6-8）。

Berejikian 也是從認知的觀點，對戰略研究引為典範的嚇阻基礎哲學思考與實際方法運用，進行批判性的質疑。他以累積的經驗來解析嚇阻假定前提—理性決策，發現決策者面對目標與威脅的決策實證經驗，是可能出現常態性的背離「理性」（rationality）原則。也就是說，決策者並非如理性決策所述，選擇矩陣內最大的利益獲取，而是權衡風險損失，即使可能遭受最小風險損失，也不會冒險改變現狀（Berejikian, 2002: 165-166）。換言之，依 Berejikian 觀察，決策者經常擔心損失而非理性的選擇保持現狀。Harsanyi 的批判亦十分中肯，他認為博奕理論中的理性決策最大問題在於，內容只是純粹虛擬的核武互動理論架構，根本沒有實際案例作為經驗內涵，更談不上任何道德價值判斷（moral value judgments），在現實世界中的可運用性甚低（Harsanyi, 2006: 2）。

George 的批判則是採相對性的戰略思考。他認為，核子嚇阻戰

略的假設前提所產生的嚇阻，其實是偏頗而且是一廂情願的「理性」，因為戰略決策者只是從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角度思考，自認可以藉核子武器的毀滅力量產生嚇阻效果，卻低估與忽視嚇阻需充份理解對手的政治、心理、文化方面所俱備的理性程度，才能制訂出可信與可靠的嚇阻戰略（George, 1991: 2; George, 1988: 1-12）。

（二）學術實證運用問題

此一部份戰略研究同樣面臨兩大質疑與挑戰；第一部份是科學流程問題；第二部份則是戰略研究通則是否具備「可證性」（testability）問題。

戰略研究究竟偏「學術性」或「實用性」爭議頗高。一般而論，學術研究首重概念建立與定義，其次則是將研究對象予以「概念化」，進而建立與研究性質相近事務的普遍屬性原則，這種普遍原則即稱為「通則」（generality）。「通則」是所有科學研究必備的基本法則，用于闡明與解釋所觀察對象的本質屬性（Goldstein and Goldstein, 1980: 198）。通則是建立在客觀理性的科學論證上，也是知識建構的基礎學問。任何以科學為方法論的學科，一旦在概念通則上遭質疑為虛擬想像而無法實證，則用於建構知識的方法論，鮮少不引致爭議，「假科學」（pseudo science）的指控即在於流程上的虛擬。⁴ 質言之，所有學科所在乎的科學性，其實是以科學流程與步驟來確認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al effects），並以可靠

4. 所謂的假科學（pseudo science）指的是任一學科雖自稱為科學，但採取的方法卻是模糊、抽象、誇張與不易實證的。事實上，彼等在知識體系上、方法論上、或實證過程上，並未遵循科學方法與步驟。參見（Still and Dryden, 2004: 265-290）。

之信度 (reliability) 與效度 (validity) 」強化研究結果。⁵

有些批判指出，為數甚多的戰略研究者經常進出政府部門，使用一套套科學方法提供付費 (a paid basis) 的政策建言，且經常涉入政策制定中，儼然是政府政策的擁護者，藉以促成政府政策的合理、合法性。本質上，這種「先入為主」「以果論因」的作法，已失去學術研究在科學方法上必要的客觀性與公正性 (Baylis et al., 2002: 9)。換言之，戰略研究者為了營造決策的高成功率，運用了一套套科學方法為掩護，提高了政策可能成功的科學假設，實際卻是結論早已定案，政策不過等待背書而已。所以，批判者認為戰略研究建立的通則不過是虛設的理想而已，是一種假科學。

Freedman 也指出，戰略決策涉及大量人、物力與資源，若目標錯置或是出現誤判情形，戰略將面臨失敗的危險，所以理論上戰略應以最科學有效方式選案。問題是，科學「通則」不是決策者必然抉擇，蓋因決策者本身有其「風險」考量，因此所謂的科學通則只是眾多決策中可能的選項之一，而不是必然的選項 (Freedman, 2002: 334)。Betts 也以 1950 年韓戰時麥克阿瑟 (MacArthur) 力排眾議，主觀地選擇風險極高的仁川 (Inchon) 地區登陸成功的戰略選擇，說明戰略決策成功與集體智慧的科學通則並無絕對關聯的問題 (Betts, 2000: 10-11)。如此一來，更弔詭而受詬病的是，戰略決策不只是科學問題，也涉及到 MacArthur 的決策是否理性問題。若是

5. 信度 (reliability) 與效度 (validity) 目的在於測量誤差。信度顯示測量包含變動誤差程度；效度是關注研究者是否正確測量他們要測量的對象問題，並依需要分為「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經驗效度」(empirical validity)、「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內外效度」(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等，兩者均是科學方法用於測量與檢證觀察對象。見 (Pennings et al., 1999: 6-7, 85-90; Burns, 2000: 350-7)。

承認 MacArthur 是理性決策，豈不否定眾多幕僚反對仁川登陸提議的客觀性？Betts 也指出，由於戰略研究者對解決威脅的執著，以及對國家安全的偏狹認知，肇致所提之戰略決策方案與講求足堪實證的科學流程無關，而只是基於「求勝」的需要。以故，決策是否科學與成敗其實並無絕對因果邏輯（Betts, 2000: 10-11）。

其次是戰略通則可證性的問題。批判者指陳，多半的戰略理論是難以「實證」的。以「嚇阻理論」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所提的恐怖平衡為例，就是一種想像且無法實證的假說。Pry 從前蘇聯崩解後陸續解密的資料與投誠者自述中發現，冷戰期間蘇聯的政軍領導人咸信，所謂的相互保證毀滅，根本是美國與西方世界虛構的假象，美國與西方世界真正的戰略意圖，是如何取得優先徹底毀滅蘇聯為目的（Pry, 1999: 7）。易言之，蘇聯根本未將 MAD 的相互嚇阻視為是雙方決策思考中的繫絆因素，反而是如何運用核子與生化武器一舉摧毀北約組織（NATO）的武裝力量，贏得勝利才是其戰略決策的優先選項（Gould-Davis, 1999: 90-109; Odom, 1998: 71）。如此一來，不啻反證了嚇阻理論中的 MAD 核子報復邏輯是一種無法實證的戰略假說？況且在任一方採取核子第一擊之後，被擊一方是否還有能力還擊並毀滅對手的假定，更是難以實證的問題。

（三）預測能力嚴重不足

戰略研究面臨的另一項挑戰是預測能力的問題。一般而言，理論來自經驗的概念通則，藉此解釋與推測類似事件的發生。因此，Kegley 認為，理論應具備四大主要功能，亦即是描述（describe）、解釋（explain）、預測（predict）、與解決方案（prescribe）等（Kegley,

1995: 8; Kegley, 1993: 131-147)。也就是說，預測能力是理論應備的條件之一。Betts 質疑，若戰略真如戰略研究者所稱，屬於理性決策且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ity)，那麼科學工具的本質不在於其「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除非戰略學者能提出戰略方案在某些條件下可以產生某些特定的結果，否則戰略評估是欠缺預測說服力 (Betts, 2000: 8-20)。

Freedman 以「事後諸葛亮」(hindsight) 的觀點評論戰略研究，他表示，戰略雖然是以個案為主的決策方式，但是戰略的運作與執行需要大量的資源。在追求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前提下，戰略失敗所付出的代價極高，但是如果戰略的設計與決策選擇只能停留在「事後證明」(judged by result)，而非具備充份的預測能力，那麼這樣的戰略既非真正理性決策，也非擁有完善的評估與預測能力。即使戰略選擇事後證明是正確的，可能也只是「幸運」或「巧合」而已，與實際的預測能力無關 (Freedman, 2002: 5-11)。以 Freedman 的觀點來看，戰略決策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且係風險極高的決策行為，那麼事前的預測與評估能力，顯然比其它學科更重要才對，而不是等待結果出爐才論斷決策的良窳。

五、戰略研究的回應

面對從哲學層面的挑戰、學術與實證運用的不當、到預測能力不足的問題，戰略研究的確困難重重。職是，本文藉 Gray、Betts、Zagare、Schelling、Baylis、Wirtz、Ermarth、Zacher、Beyerchen 等戰略研究學者為主的觀點，分別從不同角度來回應上述的批判。

（一）以生存為國家中心論的哲學假定

首先要釐清的是戰略研究哲學假定偏頗問題。事實上，知識係用於解決問題，所以不同的學科知識用於解決不同的問題，而戰略研究是研究如何使用「武力」（亦謂暴力）解決國家間紛爭問題，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儘管當代國際社會傾向反暴力解決糾紛，卻不能因此否認國家間充斥紛爭的事實。Gray 也特別指出，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變項，但置於歷史的長河裡卻是常態，而戰略研究的歷史就是延續人類歷史發展上變項，以及如何使用暴力來求取生存（Gray, 2007: 5-9）。Betts 則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回應。他認為，戰爭本身的確是非理性的，所以戰略研究者在研究戰爭，或者是運用武力時，必須出自理性態度，做出合乎邏輯的評估，以期達到政策目的及效果，並非製造殺戮。因此，戰略研究無關意識形態或道德教條。相反的，以道德眼光看待人類戰爭，或批判戰略研究為非理性者，本身即屬偏見（Betts, 2000: 22-25）。至於將戰略研究視為仰賴武力解決國家問題，也是一種偏執。畢竟，國家安全問題龐雜，並非全賴武力排除，戰略研究主要角色在於思考是否需要以武力解決國家面臨的生存安全問題。

其次是戰略難以理性決策的問題。批判者認為人不可能全然理性，何況戰略研究者本身也涉入戰略制定，因此戰略決策難以全然理性。事實並非如此，前段中 Stein 的說法固然反應出戰略在決策時，通常是處於資訊不完全的條件下進行，但這也不等於決策者的戰略選擇是不理性的。Zagare 指出，許多狀況下戰略是一種「應變計畫」（contingency plan），也是面對時間壓力下必須決策的過程狀態。此一決策，必須就當時所有可用的資訊與資源，理性的列出所有可能的行動方案，並以目標為導向選擇較大成功公算的方案，

再傾所有可用資源以追求目標達成。同時 Zagare 也認為，理性決策模式是戰略決策的工具（instrumentalist approach），用以協助決策者思考，並不需要實證案例強化其說服力（Zagare, 1987: 8-11）。Schelling 則指出，理性決策是一種「決策互賴」的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cision），係建立在計算（calculate）彼此利害多寡的互動基礎上，失去理性思考無異於失去爭取己方最大利益的可能，那麼決策豈不變得沒有意義（Schelling, 1989: 15-17）。

的確，戰略若不以理性為先決條件，則戰略必然難以規劃或處理問題而易演成衝突或戰爭。再者，戰略規劃通常以「最惡劣狀況」（worst case scenario）為計，對擁有核武對手而言，假設對方可能使用的前提下互動交鋒，以謀求國家最大安全系數，應是無可厚非的做法。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戰略在決策時難免因資訊不足出現「有限理性」的盲點，這也是戰略決策者必須面對與承擔的風險。也就是說，戰略研究者是在盡可能的理性狀態條件下評估對手的能力與意圖，並以此為基，策定戰略方案。所以戰略研究者所制定之決策與戰略決策者所選的決策方案，未必盡然一致，但理性分析與決策確是必要。

（二）戰略實證研究的危險性

批判者指責，戰略研究的理論知識是無法實證的假說。事實上，戰略研究對象是可以實證的，而且相當多的通則足堪借鏡。例如前段戰略研究分類中，傳統戰略研究者的實證是來自Napoleon歐洲戰爭經驗累積形成的通則，所以才有Clausewitz的〈戰爭論〉與Jomini的〈戰爭藝術〉等。甚至第二類與第五類型的戰略研究，也就是將戰略視為武力與政治之間的橋樑，以及蘇聯與中國的戰略文化研究

等，依然可由戰爭的歷史中覓得實際經驗為其佐證。⁶其次是戰略研究者涉入戰略制定，致使決策產生「先入為主」的問題。確切的說，批判者似乎錯置戰略研究者與決策者的角色分際。事實上，戰略研究者與戰略決策者是不同的角色扮演。前者負責理性分析與方案制定，後者負責真正決策與主要的風險承擔人，通常也是領導者，故而有其決策選擇的特殊考量，所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誠如Baylis所說，戰略係講求實際行動的學問，而戰略研究者只是理性的提供決策建言，因此並無特別可議之處（Baylis et al., 2002: 4-5）。

其次，通則化也是戰略研究面對的問題之一。Baylis 與 Wirtz 不認為戰略研究有通則化的流程問題，因為戰略研究並不侷限於傳統軍事，而是引入政治、經濟、心理等學科的方法論，所以戰略研究基本上也是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主的學科。至於戰略研究所提的決策方案，係科學性的研究結果，但最終方案選擇是屬於決策者的抉擇（Baylis et al., 2002: 9）。再者，戰略研究者進出政府決策部門問題。Gray 即表示，戰略研究社群成員自由進出政府部門，顯現出戰略研究的高度社會化與流動性，反而較清晰的看見文人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與衝擊，而美國社會適足以反映出這種現象（Gray, 1982: 2）。Ermarth 也相信戰略研究指的是一系列可以操作的信條、價值觀與主張（assertion），並藉此引導政府決策人員的行為於決策選項中（Ermarth, 1978: 138）。換言之，依上述學者的意見，戰略研究不是象牙塔的學術研究，而是必須採取實際行動的學問。

然而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戰略研究「可證性」問題，而這類問題應屬於戰略研究的第三、四類型，其中尤以核子嚇阻為典範者。

6. Gray 以 20 年 (1919-1939) 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例子證明許多國家的戰略是作為武力與政治之間的橋樑。參見 (Gray, 2007: 85-113; Johnston, 1996: 216-268)。

不幸的是，此類實證的危險性卻是顯而易見。批判者指責戰略研究所提的戰略互動是空洞的假設，是現實世界中完全無法實證的嚇阻理論，尤其是 MAD 報復邏輯所形成國際體系平衡關係，更是無法實證的推論，所以嚇阻是未經證實的假說。問題是，核子武器本身的毀滅力量是不證自明的危險，若堅持必須以核武實證來舉證學說的正當性，無異於追求可見的自我毀滅，況且第二次世界大戰投擲於日本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威力，尚遠不及當代的核子武器。Betts 因而指出，戰略評估本身有其文化邏輯思考，對手是否理解戰略決策者所釋出的訊息，固然影響戰略決策的互動關係，但是「毀滅能力」才是嚇阻的關鍵因素，這樣的因素對被嚇阻者而言，鮮少能置之不理（Betts, 2000: 28-29）。換言之，依 Betts 的觀察與解釋，決策者使用核武的決心，與瞭解對手決策背後因素多寡，對實際產生的嚇阻效能並無太大關聯，而武器本身的致命性已足夠說明一切。

進一步就實證性而言，戰爭似乎始終是戰略研究的試金石，但戰略研究也非一成不變的執著於追求戰爭的勝利。正如前段 Liddell Hart 所說，自核子武器問世之後，戰略研究已不再追求戰爭勝利，而是如何避免相互毀滅。因此，以核子武器為戰略研究途徑，確已開啟傳統戰略研究之外的另一類型戰爭研究。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核武嚇阻的戰略研究不以贏得戰爭，而採避免戰爭、維持和平穩定為導向的研究。但是值得反思爭辯的問題是，依據 Zacher 研究統計，冷戰期間從亞洲 1950-53 年的韓戰、1962-1975 年的越戰，歐洲 1974 年的土（Turkey）塞（Cyprus）衝突，1967 年與 1973 年的以（Israel）阿（Arab States）戰爭，1979 年的中越戰爭，甚至 1991 年的波灣戰爭，約 30 餘次規模大小不一的戰爭，其中也不乏擁有核武國家，衝

突並未昇高至必須使用核武解決問題的結果。⁷因此，由此亦可論證出另一項事實，戰略研究並不侷限於核武研究的單一議題而已，而是與戰爭相關的議題均為其範疇。

（三）戰略係非線性預測

預測能力不足問題，也是批判者關心的議題，但是此一問題不僅存在於戰略研究，也同時存在於廣義社會科學領域的各個學科之中。況且，預測能力不足是戰略研究學科成長過程的過渡現象，不能全然歸咎於學科式微。不過，以此為藉口並不足以支持戰略研究追求學術應然的努力方向。Beyerchen 的論點值得批判者從另一角度思考。他指出，批判戰略理論欠缺預測能力者，其實是不瞭解戰略方案的制定與產出。因為，戰略思考是一種非線性（nonlinearity）發展，無法採取一般理論的純線性思維與取向，否則會受到結構所拘泥，而陷國家於困厄（Beyerchen, 1992/1993: 59-90）。也就是說，Beyerchen 認為，理論可預測性是來自理論本身推理呈現的線性走向，也就是一種可以從過程精確得知結果的邏輯推論。如此一來，戰略決策者的選擇方案必然有跡可尋，也等於相對提供對手掌握與反制的機會，這也是前段說明研究者與決策者的最大不同處所在。

Gray 的看法也如出一轍，他指出，戰略是一種多面向（multi-dimensions）的思維，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歷史、地理等方向綜合判斷，所以戰略研究的預測也分兩個層面。以防衛為主的戰略研究為例，第一層面是戰略研究者預期，軍事力量投注於敵人後，會對敵人產生何種影響，以及敵人會有何種反應

7. 有關 1945-1990 期間的戰爭統計數字與爆發因素。請參閱 (Zacher, 2001: 221-233).

動作。因此，這一階層的預測，是軍事效能的預測。但是另一層面的預測能力則較為困難，這是預測軍事能力投注敵人後，可能產生多少戰略效果，這些效果對政治目的達成的可能性有多少助益。此一階層的預測，無疑地是政治效能的預測（Gray, 2002: 98-99）。換言之，Gray 所稱的預測能力也不是線性取向，而是一種綜合判斷。

六、戰略研究的反思與前瞻

無可諱言的，就以上的回應來看，戰略研究者的確無法完全合理回應批判者的所有質疑，但細察批判者的質疑內涵可知，較多的批判聚焦於戰略研究鼎盛時期的核武嚇阻論述，並未全然否定傳統戰略研究的存在價值，亦未挑戰戰略係武力與政治目的間橋樑的論述。也就是說，批判者質疑的是與核子武器相應產生的嚇阻理論，而後冷戰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更是讓人質疑核子武器對無國界恐怖份子行為的嚇阻能力。循此，戰略研究真如 Booth 所說，隨著核子武器興盛，也隨著冷戰一起走入歷史？Booth 一再強調，「戰略研究」與「戰略」是不同的兩個命題，不能混為一談。所以，冷戰結束就是戰略研究的結束（Booth, 1994: 118）。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戰略研究不就是在研究「戰略」所關心的問題嗎？難道戰略研究只能如 Booth 所述，狹隘的定義在核武嚇阻嗎？那麼在此之前與同期的「戰略研究」屬性豈不與歷史脫節，成為既不完全是軍事研究，因為涉及政治思考且是文人決策；也非安全研究，因為涵蓋範疇狹窄，不足以概括所有安全問題。可見，Booth 對戰略研究的觀察，省略了戰略研究已有的長遠歷史，也低估了傳統戰略研究對當代戰略研究的啟發與引領功能。同樣的，戰略研究

進入大學及研究機構，固然與核武發展相關，但如前所述，戰略研究議題也非限定於嚇阻單一議題而已，Gray 所說的武力與政治關係不就是明證？

另一項值得戰略研究反思的問題是如 Buzan 所言，戰略研究過份狹義的侷限在軍事意義上，無法涵括與解決當前國際社會的安全問題，如內戰、人權、環保、疾病等延伸為國際問題的情形相當普遍。凡此種種，皆非戰略研究範疇所能探討與處理的議題，而應由安全研究替代（Buzan, 1991: 368-374）。的確，戰略研究強調其研究是為了追求國家安全所假設的理性行為。問題是，國家安全的假設前提並不侷限在外來威脅，國家內部問題有時甚至大於外在威脅，例如 Bosnia（波士尼亞）、Kosovo（科索伏）、Chechnya（車城）、Afghanistan（阿富汗）與近期的 Georgia（喬治亞）內戰，都是國家內部分裂造成安全威脅的例子，也都突顯出戰略研究的不及之處。有趣的是，Buzan 自己也明確指出戰略研究與安全研究的區別，因為如防衛困境（defense dilemma）、權力與安全困境（power and security dilemma）、核武運用等，這些都是戰略研究的專屬議題，並不是一般安全學者所探討，這也就是為什麼不能將安全專家看成是戰略專家的根本原因（Buzan, 1991:23-25）。

從前述的批判、回應與反思中，概可歸納出戰略研究在後冷戰時期所面對的幾項事實。第一，冷戰期間以核武「嚇阻」為典範的戰略研究類型，解釋能力弱化；第二，戰爭存在的事實不因核子武器出現而消失於國際社會；第三，大規模毀滅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尤指核子擴散與生化武器）並不因嚇阻理論典範失落，而不具威脅性；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區別出戰略研究與性質相近的軍事研究及安全研究。基於這些事實，戰略研究仍有

學術研究價值與功用待發揮，因為：

（一）戰略研究仍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當前國際社會的實然現象顯示，儘管跨國性的國際組織蓬勃發展，也發揮了調解國家爭端與糾紛的功效，甚至介入國家內部事務，諸如人道救援、環保、國際反恐行動等。但是就功能與實際效果而言，目前國家仍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國家安全的維護仍仰賴有效的戰略設計與運用，此一情形不因國家大小、實力強弱而有差異。對強國而言，戰略設計與運用的重要性，仍被視為是支持政治目的達成的有效工具。美國出兵伊拉克與阿富汗即為例子之一。對弱國而言，戰略無疑是生存保障的有力工具，透過必要的戰略研究來評估、計算、方案策定與選擇，弱國得以與強國周旋並獲取必要之利益。以東協國家為例，其南海政策與設立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對維護本身權益與區域安全，確有實質的助益。對於受威脅國家而言，戰略研究更是提供政策建言，使國家安全經由集體智慧而強化。準此，戰略研究對國家生存與安全維護，仍然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功能。

（二）戰爭仍是戰略研究最關心的議題

接續前項推論，若國家安全仍為人民福祉所賴，則國家安全最大威脅來源即是戰爭。安全問題廣泛多元不一而足，解決方法也各異，然唯一使國家面對存亡者莫若戰爭。即使核武存在的冷戰環境，期間仍有 30 餘次大小規模不一的戰爭，已舉證了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的事實。所以，兩極解體恰足以說明國際社會並非只有兩強，仍有

眾多大小不一的國家，並未因冷戰結束就不面對戰爭的威脅。Latham 指出，在國家追求安全的過程中，決策者必須找出敵對與危險所可能形成的戰略壓力，或者是國家利益及生存陷於危險的戰略壓力，從而對這些壓力作出適當的戰略設計與反應（Latham, 1995: 9）。以台灣為例，戰爭並不因目前兩岸關係和緩而消失，威脅始終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即使看似已無戰爭威脅的日本與南韓，仍須戒備不預期的北韓威脅。因此，放棄戰略研究無異於放棄對戰爭的警戒，其不智可見一斑。誠如倫敦 IISS 所長 John Chipman 所說，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研究，更應該注意武力與政治之間的運作關係，因為反恐、非正規作戰、種族衝突等戰爭問題廣泛到不容忽視的地步，戰略研究不能置身事外（Chipman, 1992: 131）。

（三）以國際戰略合作強化嚇阻研究

冷戰結束之後，任何戰略研究所爭辯的議題中，核子武器都不再居於核心地位，但冷戰結束並不等於核子武器與 WMD 從戰略研究中消失，更不等於戰略研究終止。相反的，在後冷戰更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不論是核武擴散、國際恐怖活動、非正規作戰（游擊隊與叛亂軍）等問題，都需要跨國之間的戰略合作，而這些議題也都需要以武力為後盾。Payne 指出，後冷戰時期的嚇阻研究不應只是以核武為單一對象，而是針對 WMD 的擁有者（carriers）與國際恐怖份子為對象，進行另一層面的戰略研究，而這些問題超出純軍事範疇，也非安全研究者所重視的議題（Payne, 2001: 7-15; Wirtz, 2002: 309-326）。Freedman 強調嚇阻研究對象不只是核子武器，還應擴及對生化武器與放射性武器（radiological）的威脅，一方面採多國合作建立軍備控制與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對威脅明顯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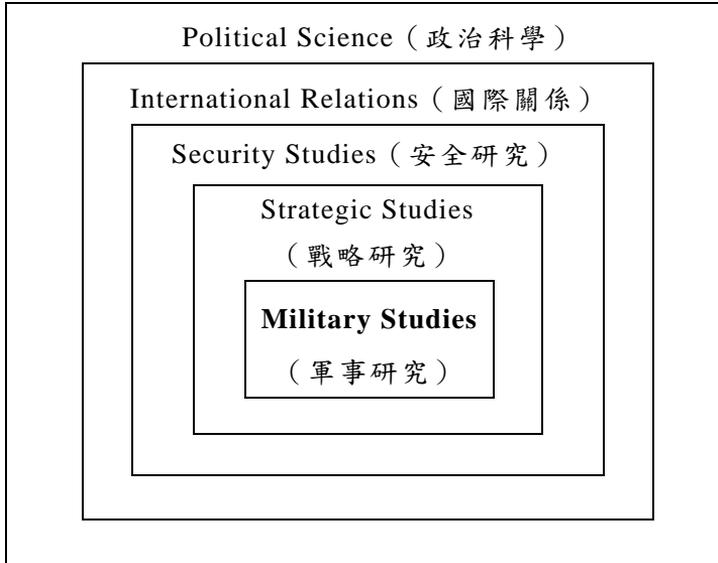
使用優勢武力排除。Freedman 所說的優勢武力，包括傳統軍事武力，以及必要時以核子武器解決核子威脅，特別是對擁有 WMD 的流氓國家 (rogue states) (Freedman, 2004: 94-99)。

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觀點中看出，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研究在研究角色與範疇上，不再侷限於國家本身的安全維護而已，而是延伸到跨國間問題解決所需的國際戰略。也就是說，已往以國家中心論為主軸的戰略研究，為因應後冷戰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與研究需要，將嚇阻議題的單一概念，擴展成為軍備控制、反恐與防制跨國性的非法游擊活動等，使戰略研究能與當代戰略環境相結合，更具彈性與研究的肆應性。

(四) 戰略研究角色的重新定位

Baylis、Writz、Cohen 與 Gray 等多位學者共同指出，戰略研究係國際關係項下的命題之一，在學科分類上介於安全研究與軍事研究之間（如表三），雖然彼此之間的研究範疇、方法論、甚至理論建構有部份近似或重疊處，但是核心哲學與研究重心卻有差異。戰略研究關心的是武力與政治間的運作關係，以及如何使用（或不使用）武力達成政治目的。安全研究範疇較廣，從個人、國內至跨國安全問題均屬之（Nye and Lynn-Jones, 1988: 5-27; 蔡育岱、譚偉恩, 2008: 151-178; 莫大華, 2003: 151-178）。軍事研究範疇較為嚴謹，係以如何採純軍事手段贏得戰爭勝利為研究範疇（Collins, 2002: 3-5; Rosen, 1988: 134-168）。

表三 政治學門分類關係表



資料來源：參考 Baylis, et al (2002:12) 繪製。

Betts 清楚明白戰略研究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局，因而在提出戰略研究依舊重要的同時也強調，戰略研究是軍事武力與文人政府間的關鍵樞紐，不僅掌控著武力的使用，也影響政治目的的達成。戰略研究雖然旁涉許多議題，如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但都不應該使戰略研究逸出以探討武力與政治目的為焦點，更不能期待戰略研究者有效解釋與處理此一議題之外的其它安全問題 (Betts, 1997: 7-33)。在談到戰略研究是否應繼續深化時，Freedman 與 Betts 提出一段發人深省的建議，他認為知識的建立是用於解決人類的問題，戰略研究面臨的問題通常是國家面對生存的問題，若戰略研究要繼續生存，就必須存活在大學之中 (Freedman, 2002: 328-342; Betts, 1997: 24)。易言之，Betts 認為大學的知識系統是戰略研究賴以不

墜的重要支柱，失去以知識為根的戰略研究，難以為繼。

Gray 也認為戰略研究是在研究運用武力達成國家政治目的藝術，不論當代國際社會如何普遍存在反軍事的風尚（antimilitary fashion），但武力仍然是國家遂行政治目的時的重要考量因素。所以，當軍事武力的運用加入文人的政治思考時，軍事就進入戰略的層次了（Gray, 1982: 1-10; Gray, 1992a: 610-635）。同理，當安全問題涉及武力使用因素時，戰略研究自然成為安全研究的核心議題無疑。Daniel Moran 更清楚的點出，軍事研究理論是戰場實證經驗堆砌的歷史推論（historical inference），用以指導軍事方面的實際執行者進行軍事行動，但是自從 WMD 問世，加上恐怖主義與非正規作戰出現，軍事研究已無法應付超出軍事範疇以外的執行能力，此時戰略研究取而代之（Moran, 2002: 17）。

綜合以上可知，確立屬性與定位是戰略研究延續學術生命的必要手段，也是學科面對不斷挑戰批判後，再度審視與重新澄清自我角色的過程。戰略研究者若想繼續維繫價值與功用，大學中講求學術論證並接受不斷的質疑與挑戰，是無可替代流程。在不斷的辯證下汰弱留強與去蕪存菁，戰略研究才能顯現出其價值功能所在。

七、結語

本文試圖綜整與歸類戰略研究屬性，並以所承受之批判為核心點，探討戰略研究的問題所在與反思及策勵。研究發現，戰略研究類別甚眾，概念架構、方法論、認知目標與理想各異，但批判觀點多半置於以核子嚇阻為主的哲學假定與方法論。同時也發現，批判者觀點雖不失中肯，卻未深入瞭解戰略研究的歷史淵源脈絡，從而

忽略了包括傳統戰略研究，以及探討武力與政治目的關係的戰略研究類型。或許正因多數的批判者將戰略研究看成斷代史，既未深究其長遠且延續的歷史源流，亦未耐心觀察戰略研究在後冷戰時期的反思與轉變，致使批判論點多半聚焦在有限期間內的單一議題上。事實上，戰略有其長遠的研究淵源，並非偶然際遇在某段的歷史時空中，故而批判所呈現的傾向也是斷代觀點。儘管如此，不可諱言的是，批判者的確指出以核子嚇阻為典範的部份盲點，特別是 911 恐怖份子攻擊事件，輪廓出以「國家」為核子嚇阻對象的不切實際，肇致理論與現實脫節，而失去了應有的解釋能力。平情而論，嚇阻典範的困境無疑也是戰略研究的困境，但這並不等於戰略研究失去價值，畢竟戰略研究仍有其賴以不墜的核心價值所在，特別是以國家生存的角度來探討武力與政治目的關係的戰略研究類型。無疑的，在不斷揚棄過時的舊典範之際，後冷戰時期的環境，無論是國家本身或者是國際社會，仍有許多可供戰略研究積極發揮的議題與空間。

參考書目

- Baylis, John and John C. Garnett. 1991. eds. *The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Pinter.
- Baylis, John et al. 2002.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aufre, Andre.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Berejikian, Jeffrey D. 2002. "A Cognitive Theory of Deterr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9, 2: 165-6.
- Beyerchen, Alan D. 1992/1993. "Clausewitz, Nonlinearity,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3: 59-90.
- Betts, Richard K. 1997.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50, 1: 7-33.
- Betts, Richard K. 2000. "Is Strategy an Illu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 5-50.
- Booth, Ken. 1979.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 Booth, Ken. 1987.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Vol. I: Theories and Concepts*: 30-37.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Booth, Ken. 1990.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o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121-128. London: Macmillan.

- Booth, Ken. 1991. *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 Booth, Ken. 1994. "Strategy." in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109-119. London: Mansfield Publishing Limited.
- Booth, Ken. 1996. "75 Years on: Rewriting the Subject's Past—Reinventing its Future." in Steven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328-3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die, Bernard. 1959. "The Anatomy of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 51, 2: 173-192.
- Brodie, Bernard. 1973. *War an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Bull, Hedley. 1968.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20, 4: 593-605.
- Burns, Robert B. 2000.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Buzan, Barry.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 Buzan, Barry.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Chipman, John. 1992.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al* 34, 1: 109-131.

- Clausewitz, Carl Von. 1976.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John M. 2002. *Military Strategy: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Inc.
- Davis, Malcolm R. and Colin S. Gray. 2002.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254-2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marth, Friz. 1978. "Contrast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 4: 138-155.
- Freedman, Lawrence. 1992.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reedman, Lawrence. 1998. ed. *Strategic Coercion: Concepts and Ca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dman, Lawrence. 2002. "Conclusio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328-34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dman, Lawrence. 2004. *Deter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allois, Pierre. 1961. *The Balance of Terror: Strategy for the Nuclear Age*. Boston, Mass:Houghton Mifflin.
- George, Alexander L. 1988. "Factors Influenc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lexander L. George et al. eds. *US-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Failure, Lessons*: 1-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L. 1991.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 4, 5: 2-12.
- Gerasimov, Gennadi. 1982. *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 Moscow: Novosti Press.
- Gilbert, Felix. 1986. "Machiavelli: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11-3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Martin and Inge F. Goldstein. 1980. *How We Know: An Explanation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New York: Da Capo Press, Inc.
- Gould-Davis, Nigel. 1999.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1: 90-109.
- Gray, Colin S. 1979. "Nuclear Strategy: The Case for a Theory of Vic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 4: 54-87.
- Gray, Colin S. 1982.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ray, Colin S. 1986.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Gray, Colin S. 1988.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ray, Colin S. 1990. *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for the Nex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ray, Colin S. 1992a "New Direction for Strategic Studies: How Can

- Theory Help Practice?” *Security Studies* 1, 4: 610-635.
- Gray, Colin S. 1992b. “Deterrence in the New Strategic Environment.” *Comparative Strategy* 11, 3: 247-267
- Gray, Colin S. 1993. *Weapons Don’t Make War: Policy,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Gray, Colin S. 1994. *The Nav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The Uses and Value of Strategic Sea Power*.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ray, Colin S. 1996. *Explorations in Strate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Gray, Colin S. 1999a.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Colin S. 1999b. “Why Strategy is Difficult.” *Joint Force Quarterly* 1, 22: 6-12.
- Gray, Colin S. 1999c.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1: 49-69.
- Gray, Colin S. 2002. *Strategy for Chaos: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 Evidence of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 Gray, Colin S. 2006. *Strategy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Abingdon, UK: Routledge.
- Gray, Colin S. 2007.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Green, Philip. 1966. *Deadly Logic: The Theory of Nuclear Deterren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alle, Louis J. 1984.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 Primer for Nuclear Age, Vol. X: American Values Projected Abroa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Harsanyi, John C. 2006. "A General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 in Game Situation." in Michael Allingham. e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II*: 1-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t, B. H. Liddell. 1960. *Deterrent or Defense*. London: Stevens Pub.
- Hart, B. H. Liddell. 1967.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4th 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Holsti, Kalevi J. 1991.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sti, Kalevi J. 1996.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83/1984.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tali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3: 35-46.
- Jalonsky, David. 1993. "Why is Strategy Difficult." in Gary L. Guertner. ed. *The Search for Strategy, Politics and Strategic Vision*: 3-45.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9.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31, 2: 289-324.
- Jervis, Robert et al. 1985.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89.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5.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6.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216-2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hn, Herman. 1960.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egan, John A. 1993.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Knopf.

Kegley, Charles W. 1993. "The Neoidealist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alist Myth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 2: 131-147.

Kegley, Charles W. 1995.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to Realist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1-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issinger, Henry A. 1969.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and Company.

Kuhn, Thomas. 1991.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n Richard Boyd et al. ed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8-157. Cambridge, Ma.: MIT.

- Latham, Robert. 1995. "Thinking About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Policy Note* 20, 3: 1-9.
- Laudan, Larry. 1998. "Dissecting the Holist Picture of Scientific Change." in Martin Curd and J. A. Cover. 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140-145.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Lebow, Richard Ned. 1994.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2: 249-77.
-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1995.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uttwak, Edward. N. 1987. *The Logic of Pe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Lean, Iain. 1996.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an, Daniel. 2002. "Strategic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War."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17-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Williamson and Mark Grimsley. 1994. "Introduction: On Strategy." in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1-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ye Jr., Joseph S. and Sean M. Lynne-Jones. 198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1: 5-27.
- Nye Jr., Joseph S. 1989. “The Contribution of Strategic Studies: Future Challenges.” *Adelphi Papers* 235: 20-34. London: IISS.
- Odom, William E. 1998.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Jr., Bruce. 1978.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in Bruce Palmer Jr. ed. *Grand Strategy for the 1980s*: 73-11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Payne, Keith B. 1996.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Payne, Keith B. 2001. *The Fallacies of Cold War Deterrence and a New Direction*.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Pennings, Paul et al. 1999. *Doing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Methods and Statis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Pry, Peter Vincent. 1999. *War Scare*.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 Rosen, Stephen Peter. 1988. “New Way of War: 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1: 134-168.
- Rosenau, James N. and Mary Durfee. 1995.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Coherent Approaches to an Incoherent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chelling, Thomas C. 1989.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L. 1977.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 C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 Stein, Arthur A. 1999. "The Limits of Strategic Choice: Constrained Rationality and Incomplete Explanation." in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1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ll, Arthur and Windy Dryden. 2004.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seudoscience': A Brief History." *Theory Social Behaviour* 34, 1: 265-290.
- Ullman, Richard H. 1983.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129-153.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Strategy'." in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doddict/data/s/7303.html>. Latest update 17 March 2009.
- Walt, Stephen M. 1991.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2: 211-239.
- Wirtz, James J. 2002. "A New Agenda for Security and Strategy?" in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309-3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ylie, Joseph C. 1989. *Military Strategy: A General Theory of Power Contro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 Zacher, Mark W. 2001.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 2: 221-233.
- Zagare, Frank C. 1987. *The Dynamics of Deterre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Zagare, Frank C. 1990. "Rationality and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 42, 2: 238-260.
- Zagare, Frank C. and D. Marc Kilgour. 1998. "Deterrenc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0, 1: 59-87.
- Zagare, Frank C. and D. Marc Kilgour. 2000. *Perfect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鈕先鍾。1995。《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
- 鈕先鍾。1998。《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
- 莫大華。1996。〈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問題與研究》35, 6: 39-52。
-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
- 陳偉華。2002。〈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41, 2: 23-42。
- 蔡育岱、譚偉恩。2008。〈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7, 1: 151-178。

Critics and Reflections of Strategic Studies: Stalemate of the Paradigm

Wei-Hwa Chen*

Historically, the origin of Strategic Studies began very early and its definitions and scopes have evol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state-centric approach was seen as a main tool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rough which states are seeking their survival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en the bipolar system collapsed, critics argued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knowledge-building for Strategic Studies were apparently short of scientific proof and testability. Critics also challenged the feasibility of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predictability of Strategic Studies. This essay has collected some of the main critics and has found that the course of Strategic Studies has evidently been affected by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which has rendered not only the danger of paradigm lost but also its stalemate. In so doing, Strategic Studies may highlight its value and function so as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with Military Studies and Security Studies and establish a specialty of its discipline. In conclusion, Strategic Studies has to abolish its outdated paradigm, as this essay indicates, and build up new research fields. In addition, whatever

*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ng Chuan University.

changes are made to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Strategic Studies will still be considered a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and instru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survival.

Key words: strategic studies, paradigm, deterrence, rational choice, security studies, military studies